

“善”待国际交流，“诚”就翻译腔之美

冯 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翻译为国际交流而生，翻译腔自译事起始便成为了挥之不去的客观存在。无论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还是近、现代的直译与意译之争；无论是输入翻译带来的汉语欧化，还是中华文化外译颇受关注的中式英语与中国英语之辩，实际上都涉及了翻译腔问题，只不过并未假以翻译腔之名罢了。

一、对翻译腔认识的转变

译界最初对翻译腔的认知是负面的，认为是译者受能力和源语形式所限产生的不符合目的语规范的译文，是译者精炼本领需要克服的顽症。随着翻译研究的语文学路径、语言学路径逐渐转向文化路径、社会学路径等新的探索，不断发掘出译文产出背后的诸多操控因素，学者对翻译腔开始有了新的认知。不仅将翻译腔归因为语言差异，也认识到认知差异、审美差异、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以及翻译目的等因素都会带来影响。译学家罗宾逊（Robinson）、韦努蒂（Venuti）等人纷纷质疑将翻译腔等同劣质翻译，翻译腔因此也有了消极与积极、低级与高级之分。

确实，翻译腔虽饱受诟病，却也有为人喜闻乐见的一面。且不说佛经翻译中不少梵语的音译、直译或是为了祈祷甚至实施神咒之功，清末民初，因大众对舶来品的喜爱，模仿并放大西文语言特点的伪译作品不断问世。但凡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倡导的直译之风更被视作个人借翻译进行汉语改造、文化更新的政治佳话。近年来文学翻译中支持翻译腔之声亦不在少数。即便当下，在中国经济发展、文化自信的背景下，模仿西文表达的文学创新尝试时有发生；纵是老百姓也耳濡目染，常调侃“来段译制腔给老爹打电话”。语言的发展，历经优胜劣汰，一些翻译腔得以留存，已然欧化生长在我们的语言系统中。而我们的给力（gelivable）、

加油（add oil）、好好学习、天天向上（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等中式英文表达也被《牛津英语词典》所收录，中国文化特有的物质、精神、制度文化词汇和表达在国际交往中也开始树立起自己独特的身影。这些使用中的翻译腔无不见证了文化的交融。

最近的一些研究，尤其是语料库翻译学的翻译共性研究都显示机器能自动并且准确识别和区分翻译文本与原文本或直接用源语或译语创作的文本，支持了颇受争议的翻译腔是独立存在的第三种语言（the third code）的观点（Frawley, 2000），这也与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所提出的文化交流存在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以及译学家皮姆提出的译者双文化特征当属第三种文化的观点不谋而合。学界对翻译腔研究的重点已经逐步从负面认知转向到中性认知，翻译腔于是有了非负面的中性定义：受源语影响而产生的译文结果。

二、翻译腔是一种中间体

无论是第三种语言、第三种空间还是第三种文化，在国际交流中，译者由于需要面对语言、文化、审美与社会规约以及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各种差异，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会偏离以两种语言为母语直接写作的作品。鉴于此，翻译产出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中间存在。这与中介语理论将二语习得者使用的外语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事实

上,翻译腔的研究与中介语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毕竟,译者在母语与非母语之间的转换,无论是理解还是表达过程都牵涉到非母语的习得。有学者认为直接翻译表示译入母语,不会产生中介语,而逆向翻译才既带有翻译腔又带有中介语的特点(乐明,2021)。这种区分不无道理,中介语和翻译腔在一定范围内确有交叉,应依据研究目的划定范围。但是,倘若坚持要看翻译腔的全貌,考察源语对译语的影响机制以及翻译行为的普遍规律,自然无论何种语对、何种方向的翻译都可以包括进来。

译文的中间体属性使得翻译文学同本土文学、外国文学区分开来,以独有的身份与这两者并置共存,彰显出语言表达的生命力和文学创造的无限可能。同样,在对外传递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与中式英语(Chinglish)也得以区分开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要表达中国独有的思想和事物,在遵循规范英语的同时,词汇、句式、谋篇布局等方面必然会带有某些汉语语言和文化特征。而那些因英语水平有限,模仿汉语规则和习惯而产生的不合英语语法或文化习惯的蹩脚英语,则被称之为中式英语。中国英语,虽没有将英文作为官方语言而成为制度化的变体,但其在国际交流中基于使用、基于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思维,成为了使用型的变体。同样的原文,我们常可见从中式英语到中国英语的不同层级的表达。

综上,所有的译文都可以视作是基于源语和目的语创作之间的中间体。翻译腔既是译文的一部分,也会继承其中间体不稳定的性质,在该区间内存在合理和不合理的空间、高级和低级的表现、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三、积极翻译腔保留的异质价值

积极的翻译腔往往是译者有意为之,体现的是对他国语言表达、认知体系、思维方式、价值观等异质价值的识别、接纳与尊重。在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指向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中,翻译是各种异质价值博弈的舞台,无不体现出各种差异的冲突和调和。比如,文学翻译中,积极翻译腔多保留的是相对目的语文化而言具有创造性的美学或诗学价值;注重知识和信息交流的科技翻译中,积极翻译腔多出现在不能被现有知识体系同化的新领域;文化翻译中,积极翻译腔多折射出弱势文化争取生存空间对抗强

势文化的努力;学术翻译中,积极翻译腔多坚守的是一国学术的不同路径和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政治翻译中,积极翻译腔多引导的是他国对本国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深入理解而非表层接触。

面对这些异质内容,人类的态度无非几种:厌恶规避、喜欢接纳或者漠不关心。接收国文化系统对异质内容的态度,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是不断面对新变化、新事物做出反应,以达到系统的自我调试、自我修复,并在一定时期内趋于稳定。各异质内容所对应的社会子系统会根据主流规范对其进行甄别,并相应采取排斥、适应、接受或再造等操作。因此,译者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应本着文化平等的原则,秉着专业的精神,不仅应敏感地识别这些差异,同时还应当审时度势,考察这些差异对于目的语文化生态是正向还是负面的影响,使这些差异真正成为保护文化生态的异质价值,为文化间的平等交流做出贡献。

四、“善”待国际交流,“诚”就翻译腔之美

翻译腔能否被赋予合理存在的空间,关键在于“度”。译者作为翻译工作的主体和文化的传播者,需要对这个“度”加以把握。

首先,“善”待国际交流。当源语蕴含的异质价值与译者自身的认知图式发生碰撞时,译者应敏锐察觉异质成分的存在,在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的前提下,在不影响本土文化生态,甚至是改良本土文化的善的前提下,打破文化偏见,对异质价值进行有意的、有度的保留。译者应在翻译伦理的指导下,妥善处理文本内外所涉及的社会关系,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

善只是第一步,还需要译者的真诚。真诚体现的是译者为了善之目的所作的、真诚的努力。高层次的翻译腔需要创造有度,以不破坏基本语法句法为限,创造出能为目的语所接受、具有积极意义的翻译腔,这才是高级境界的兼容并蓄。真诚的译者会为了一个难题,哪怕踌躇数日,亦不放弃。

译事之难在于差异的弥合,需要译者以善攒起勇气,以真诚去做努力,甘冒违反现有语言规范的风险,创造性地将异质价值与本土文化对接。如此的翻译腔,真正地凝结了翻译的光环和价值,催化了文化多样性在不同语言中的滋长,这是翻译之美,也是积极翻译腔应当追寻的翻译腔之美。不仅包含了本土语言借翻译腔之美的创新和精进,也有中国英语/外语借翻译腔之美传递的中华智慧、文明和文化自信!